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

演讲人：钱学敏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演讲时间：2008年8月20日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1935年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翌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曾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返回祖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并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1998年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至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兼任第七届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空气动力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1984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57年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由于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诸多技术科学领域以及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他获得了来自国内外的很高荣誉。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1986年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1年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同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创建系统学》等。

钱学敏　祖籍浙江杭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1989年以来参加钱学森亲自领导的学术研讨班子，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思想。著有《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等。

钱学森先生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每提到科技要发展、祖国要强大时，就必然提到教育要革新、人才要培养。2005年7月30日，他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他所强调的杰出人才，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上有重大突破和发明创造的人才和帅才，他认为科学精神的灵魂就是创新。

今年夏天当他又见到温总理时，虽然他已97岁高龄，心中想说的话很多，但主要牵挂的还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因为他深深地感到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在青年”。当今，科技和教育将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素。钱学森希望办好大成智慧教育，改革教育制度，缩短学制，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高度智能和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是时代的呼唤。

大成智慧教育的方案

如何尽快提高人们的智能和品德，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是钱学森几十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着力探索与思考的重大课题。他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凝聚着无限关爱与希望。他认为这是件大事，其意义甚至不亚于当年研制、发射“两弹一星”。

他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在于使人们面对新世纪各种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事物时，能够迅速做出科学而明智的判断与决策，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大成智慧学”与以往关于智慧或思维学说之不同，在于“大成智慧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迅速有效地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信息、知识、智慧之大成，总体设计，群策群力，科学而创造性地去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

1997年春，钱学森在对科学与艺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哲学与科学技术以及微观与宏观、部分与整体等进行综合思考以后，更为明确与全面地阐述了“大成智慧”的实质与核心。他说：“我想我们宣传的‘大成智慧’……就在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整体（形象）思维与细部组装向整体（逻辑）思维合用；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哲学要指导科学，哲学也来自科学技术的提炼。这似乎是我们观点的要害：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

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改革考虑得十分具体。他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又勤奋、能吃苦，只要制度合理、教育得法、组织得好、具备一定条件，就没有什么高科技难关是攻不下来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就是一例。

现在我国的教育事业已有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全国来看，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应该说仍严重滞后。需要高度重视，好好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也要认真吸取旧中国一些成功的办学经验，以及国外值得借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强调，教育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速见成效。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新的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相继到来，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发生变革，我们在制订教育方针时，一定要向前看，像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注全球性、国际化的教育标准，用世界范围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充实教育的内容。尽快革新教育观念、更新教学方法、改革教育制度、增加教育经费。

为解决师资难的问题，钱学森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包括下岗、退休的）有经验、有学识的人，都来当教师或兼职教师，也要竭力创造宽松、民主而优越的环境，吸引外国的高科技人才和我们的出国留学生，共同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最新鲜的实践经验，不失时机地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以高等教育为主体的、能够使人终身受教育的教育体系，以适应信息社会逐渐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高科技、高效管理、职能变换等快速发展的要求。

20多年来，钱学森在采撷时代精华、探索“大成智慧学”的同时，曾反复设计21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他结合自己和同学在北京师大附小、北京师大附中、上海交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院校受教育和成长过程的亲身体验，吸收了思维科学以及一些科学工作者对教育心理学、脑科学研究和实验的成果和感悟，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和文章，希望能够缩短学制，充分挖掘和发挥少年儿童的潜力，着重培养青年一代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高度的智慧和创新的能力。

仅从1993年10月7日钱学森给我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对未来教育方案的大致设想和希望办好大成智慧教育，培养一代新人的殷切之情。他写道：“我在这几天又在想中国21世纪的教育，我1989年的那篇东西不够了；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①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②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③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这样的人是全才。我们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伟人，走到19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教育；再走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教育体制；再走到今天的理工文（理、工加社科）结合的萌芽。到21世纪我们又回到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了；但有一个不同：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

“大致可以作为下面这几段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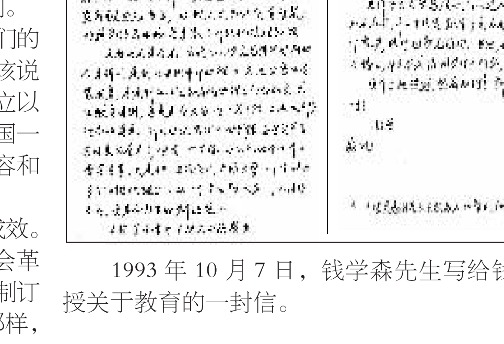
① 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

② 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③ 后1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

“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

“这个大胆设想，您看如何？新一次的‘文艺复兴’呵！”



1993年10月7日，钱学森先生写给钱学敏教授关于教育的一封信。

大成智慧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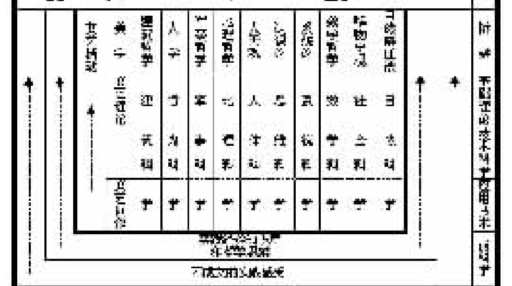
大成智慧的要害是：集大成　得智慧！“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按照钱老的想法，集的对象主要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或称人类知识体系）中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有体系外围的前科学知识库，这些是形成大成智慧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所以，钱学森特别强调大成智慧硕士要“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只有了解、掌握了这些人类知识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才能更好地汲取、集成人类的智慧。

20世纪80年代，钱老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不单是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钱学森认真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成就与趋势，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建立起一个开放复杂的人类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人类知识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所有通过人类实践认知的学问。目前暂时分为11个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这个体系不仅结构在发展，内容也在充实，还会不断有新的科学部门涌现。因此，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以至教学方法，也需要不断充实、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钱学森曾在1994年4月1日对我说：“大成智慧的核心就是要打通各行各业各学科的界限，大家都敞开思路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整个知识体系各科学技术部门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人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这些交叉点上，所有知识都在于此。所以，我们不能闭塞。”他也时常强调，我们掌握的学科“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而大成智慧学却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由此，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需要更自觉地将专业课、非专业课、实验课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工、文、艺等有关各科合理地安排进行，打开过去各门科学技术之间隔行如隔山的狭隘界限，使学生易于触类旁通，获得广博的知识，逐步走近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和规律性认识，形成全新的理念，学会从总体上、大跨度地、综合性地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理论和规律，以便能够广开思路，系统地、创造性地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近来，钱学森还特别强调：“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或许可以说，大成智慧与创新思维也来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重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荡漾于人类知识海洋里的学问，既有认识客观世界的，也有改造客观世界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人类知识体系的纵向结构上，每一个科学技术部门都按照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比较间接地联系改造客观世界的原则，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划分略有不同）。

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钱学森曾说：“人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才能进而改造客观世界。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而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

所以，钱学森赋予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涵义，实际上体现了科学与技术原本就具有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性。例如，在自然科学部门中，物理学、数学属基础科学；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属技术科学；航空航天工程、电力工程属应用技术。又如，在行为科学中包括教育、道德和法，其中教育学、伦理学、法理学等属行为科学的基础科学；教育系统工程、道德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有些内容属技术科学层次，有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和实施方法，可能要属于应用技术层次。但这三个层次的知识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谁也离不开谁。

科学技术三层次的区分，便于我们在进行大成智慧教育的过程中，自觉地把科学技术三个层次的专业和教学内容合理设置与安排，使理论易于联系实际，培养出有高度智慧又有实际能力的人才；也便于我们迅速明确某个学科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易于找到薄弱层次和新的科技生长点，打开局面，集中人力、物力，去研究、去探索、去创新，促进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工委，主管国防科技大学，当时学校要进行教育改革，他根据自己当时熟悉的科技领域，建议在国防科技大学所设置的八个系的专业就是把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统一起来的考虑。它们是：

一系：力学与应用力学；二系：核物理与物理工程；三系：控制论与控制工程；四系：电子学与电子工程；五系：化学与应用化学；六系：计算机理论与工程；七系：数学与系统工程；八系：仪器与仪器设计。

钱学森主张每一个专业都应是理与工的结合，课程设置既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又有应用技术、工程技术。专业不要分得太细，否则学生将来适应能力差。要想在“科教兴国”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尽快出智慧、出成果、出人才，就不仅要教育学生学会多学科知识的综合集成，还要注意教育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经验有机地、合理地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学校，有些专业还可采用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要特别尊重和提炼前科学知识库里的精神财富。在人类知识体系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外围，有大量一时还不能纳入体系中的古往今来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认知、初步的哲学思考以及点滴的实践经验、不成文的实际感受、直觉、顿悟、灵感、潜意识、能工巧匠的手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甚至梦境等等，这些都是前科学知识库里的瑰宝。

这些无数的瑰宝流动、变化很快，云蒸霞蔚，有的只是一闪念，转瞬即逝，仿佛没有什么逻辑，但在我们头脑中有，归根结底也是实践的产物，通过人们主动地、有目的地在实践中反复比较、鉴别、分析、综合，可以逐渐将其中有价值的初步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纳入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使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智慧不断丰富与发展，这是人们认识与实践的历史长河，烟波浩荡，永不停息。它是科学知识和艺术创新的源泉，是我们终身都需要认真学习、积淀，注意汲取、历练的宝贵精神财富。

哲学与科学技术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人认识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科学，它的宇宙观（包括科学观、发展观）、人生观、方法论，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展以及对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历程的指导作用是很重要的。钱学森50年来一直强调科学家和年轻人要掌握科学的哲学。

记得1956年初，他刚刚回到祖国不久，有记者访问他说：“您认为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钱学森略微沉思一下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这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与丰富的。

后来，钱学森在参与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和探索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过程中，逐渐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科学技术部门三个层次之上，又揭示出了一个层次，就是各学科的哲学概括。这是通向整个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它们是：自然科学的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数学科学的数学哲学；系统科学的系统论；思维科学的认识论；人体科学的人天观；军事科学的军事哲学；行为科学的人学；地理科学的地理哲学；建筑科学的建筑哲学；文艺理论的美学等等。

钱学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科学技术整个体系的最高层次，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它决不是独立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外的，它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联的。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全部科学技术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全部科学技术。”

钱学森又结合当今科技发展的现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人的一切实践的概括”。可见，它的内容更加丰富而科学，不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了。

早在1978年，钱学森就强调：“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而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先着眼于那11架桥梁，然后再考虑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各门科学技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也会有着深刻的影响，从钱老的下列几例可见一斑：

他根据当前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在人们观察和研究宇宙时惯用的“宇观”、“宏观”、“微观”之外，又提出“胀观”与“渺观”。为从各个层次上研究和认识客观物质世界打开了通道。这个统一而多层次的宇宙观，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了更为深入的科学论证。

他关于科技革命必然引起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社会历史观；关于现代中国的三次社会革命论；关于世界社会形态等理论；以及关于要特别重视研究国际间军事和政治的斗争、要特别重视研究如何运用金融手段来发展经济的“金融经济学”等观念，都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

他倡导的系统科学，是从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各种复杂系统的结构、层次、功能、性质等侧面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特别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观念和理论，强调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从整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以及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建立总体设计部等，都是进行高层次系统管理和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理念和最佳方法，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

他倡导的思维科学，是研究人脑通过思维活动，怎样处理从客观世界获得的信息的科学。侧重于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等设备与技术，通过人——机结合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自觉地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因而，使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而且应看到，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的补充、更新、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学高峰离不开理论思维，在新的世纪里，科学技术与哲学将更加相互交融、相辅而行。

需要教育年轻一代头脑不能僵化、机械、教条，或仅仅耽于虚无缥缈的幻想，要逐渐树立起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努力将经验——科学技术——哲学综合集成起来。使“大成智慧”不断集成出新，在哲学思想、领导艺术和科学决策上抢占制高点，赢得竞争的胜利；让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和谐、幸福的崇高理想影响全世界！

加强情感和品德教育

大成智慧教育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使人能够不断及时获得和集成广泛而新鲜的知识、信息与智慧，从而迅速提高人的智能，培养创新的能力。但是，人——机结合这种教学方式、思维方式，也不是对什么样的人都灵。关键还在于以人为主，培养学生的品德与素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因为，一方面计算机、多媒体、灵境（Virtual reality）、信息网络等微电子信息技术，正逐步向智能化改进；纳米技术的出现，将使计算机的研制、开发进入到分子、原子层次上；人工智能，知识工程，计算机模拟等技术发展很快。它们对于可以形式化、数字化、或运用形式逻辑推理就能认识和解决的事物，处理起来比较擅长。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可以存贮、调集、检索、传递的信息数量浩如烟海，速度快如闪光。其计算和运转之快，比人脑强亿万倍，而且十分精确。这种惊人的高性能真是旷古未有，非常有利于人类知识的集成、智能的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计算机、多媒体、灵境（虚拟现实）、信息网络等技术，对于信息激活（information inspiriment）、对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形式化、数字化的复杂性事物，或者说，对于那些需要运用形象思维，或必须灵活地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交织使用才能把握其关键和机理的事物，对于一些非理性的、经验性的，以致掺入人的精神、情感等因素的复杂性事物，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工具，目前尚难以十分准确地独自模仿、认清和解决。

（下转11版）

《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

演讲人：高　放

《光明日报》今年7月3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研究员写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华中族的百年命运》（以下简称《杨文》），文中就《宣言》12个中译本的译者、特点、出版情况等作了全面、扼要概述。这对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很有帮助。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一直教政治理论课，几乎年年都要学习、讲解《宣言》。对这一本划时代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以说心有专注，情有独钟，长期搜集、收藏不同中译本，并进行比较研究。《杨文》促使我去盘点核实我所知道的各种中译本，累计竟有23种之多，足见《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在把《杨文》尚未提到的11种中译本简介如下，并对《杨文》某些不确切和过于简略之处稍加订正和补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有9种中译本

早在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我就曾在3月4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文中提到“中文先后有过十五种中译本”（拙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当年5月我到中央编译局参加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会时，编译局一位老领导曾经问我：“老高，你说《宣言》有十五种中译本，真有这么多种吗？”我说，这是依据我搜集到的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十年来，我又查寻到八种中译本，所以总共有二十三种。本文所补充介绍的这十一种，其出版地点是：两种在东京，一种在北京，一种在莫斯科，三种在香港，四种在台北。

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的。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的是蜀魂译的五本书，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三辑《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275页）。

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其中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还有克鲁绝特金著《面包略夺》等。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见上引《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286-293页）。查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确实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的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之均无所获，并且复印了上述《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版权页和《天义》报所载民鸣译《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寄赠给我。版权页上增加的信息有社会主义丛书的代售处为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宣言》第一章的标题资产者与无产者，民鸣译为绅士与平民。现在我把1907年、1908年这两种中译本的信息公诸于众，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

第三种中译本是《杨文》评介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上世纪20-30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我也是在1944年上高中二年级前，一位进步老师借给我读这个译本，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后来直到1980年我才从《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借到1965年该社翻印的陈望道译本的简体字本复印一册。陈译本第一版只印1千册，现在仅保存有11册。《杨文》列出了这11个收藏处，可惜其中有4处写得不准确。现据红色收藏家范强鸣选编的《红色中华第一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的图文解说和有关资料加以订正。中国革命博物馆已于2003年2月28日改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应为延安革命纪念馆（自1950年7月建馆起从未改名），山东广饶市博物馆自1995年12月改名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应为浙江上虞市档案馆（上虞自1992年10月18日撤县改市）。

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杨文》只说华岗是“我党理论家”，这里略加补充。华岗（1903-1972），生于浙江龙游贫农之家，1920年小学毕业考入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4年转入宁波四中续读高中，把幼名华延年改名华少峰。这一年春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署名少峰，秋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夏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团中央即任命他为团南京地委书记，9月他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从此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受命作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的部分工作。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他受命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并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一次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从这时起他发表文稿才用华岗）。我是在1973-1978年因人大停办，转到北大教书期间，从北大图书馆头一次借读到这个译本的。到1982年秋才又从北大借出此书复印一册。另外，我于1957年年底在东四人民市场旧书店还买到《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署名彭汉文编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内容包括华岗译《宣言》。长期以来我对此书编译者彭汉文是否华岗别名，难以判明。《杨文》也讲到：“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按照这种说法，该书编者潘鸿文和译者华岗似乎是两个人。我认为，这两本书的书名与内容完全一样，此书编者潘鸿文与上述我买到的那本书的编译者彭汉文，发音相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那么潘鸿文与彭汉文是否华岗的别名呢？前两年华岗的女儿华景杭来拜访时我同她探讨了多次。景杭1947年出生，华岗于1955年因胡风案蒙冤入狱（1972年惨死狱中，1980年彻底平反），她不可能知道往事细节。从她送给我的向阳著《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得知：华岗1924年在宁波四中参加革命活动时有一位亲密战友潘念之，本是宁波育德中学教师，比华岗大几岁，当时他担任团宁波地委书记，华岗是宣传部长，“团宁波地委给上级写了许多报告，署名都是潘枫涂（念之）和华少峰的名字或代号。”（《华岗传》第53页）我们都认为华岗以潘鸿文为别名出书很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老战友，至于到1938年又改名为彭汉文，可能由于此书已从上海改为在汉口出版。

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写的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既然博古的校译本是1943年8月才出版，可是《杨文》又说这个译本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这里所说的1938年显然不准确，发行量也不可能达几百万册。当时各解放区干部总数才约有几十万人。我于1948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也是研读这个译本。

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我早知有这个新版本，但是在内地一直查不到。直到1988年10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才复印一册带回。该书署名译者成仿吾、徐冰、乔木（乔冠华的笔名），校后记说：“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如果只看这个说明，就会认为这个新版本不能算是新译本。但是我粗略比较一番，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仅举一例，原译第二章在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时说：共产党“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乔木校译时改为“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所以本书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署名成仿吾、徐冰、乔木译，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高　放　福建福州人，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毕业。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共运》杂志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二届会长。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著《普列汉诺夫评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评〈第三次浪潮〉》等。

第九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杨文》说：“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此说恐不准确。该版本里封明确印有“一九四九。莫斯科”，即是说该书最早也是1949年春天才出版。我是1949年3月6日随华北大学队伍进入北京城，贪婪地多次逛书店，到12月间才买到这个珍本的（也可能早几个月已开始出售）。

新中国成立后有8种中译本

第十种中译本是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中国人民大学于1953年12月5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版本，封面写明“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里封写明成仿吾、徐冰合译，又加上〔校译版〕，印数2349册，定价0.26元。当时学校发给我们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全体教师人手一册。成仿吾副校长在“重校后记”中说：1938年他与徐冰合译的本子有很多缺点，直到1944年他从敌后回到延安才利用空闲加以校正，但是这个校正本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遗失了，这次校正又是他一人作的。这次校正他又作了很多修改。例如，《宣言》开头一句，旧译“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新译改为“一个魔影出现在欧罗巴”；第一章节一句，旧译“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新译改为“一切从来底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底历史。”

第十一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粗读可能以为此书就是采用上述莫斯科1949年初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的译文。细加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全书（不包括四篇序言）修改有67处之多，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例如，在《宣言》开头引言中，百周年版译为“各国共产党人”，《文选》改译为“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这是重要的订正。因为1848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它约有400个党员，有德、英、法、比等多种民族成员。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说的中央编译局于1958、1964、1972、1995、2008年先后重新校译的五个译本。这是出版数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译本。

第十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最后简略提及的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新译本。本来自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建立以来，人民出版社通常出版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什么1978年能够另外出版成仿吾翻译的《宣言》呢？内中秘情现在可以披露。原来是成老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不大满意。他从1954年起先后调任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校长，“文革”中横遭批斗。1972年8月毛主席见到山东省委上报的要保护的老干部的名单，其中就有成仿吾，毛主席特批“此人来北京”。9月他来京，可是到翌年2月仍未安排工作，只好又回济南。1974年7月他写信给毛主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又说自己有德、英、法、俄、日五种语言文字能力，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8月间毛主席批示同意他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校正工作，“在中央党校安排一个位置，给几个助手”，并且要他来京参加国庆大典。12月间他出任中央党校顾问，调李逵六、白晓明等熟谙德文等外文的年轻同志协助他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原著。1975年8月《宣言》校译本初稿铅印出来后，成老曾派人到北大国际政治系找到我（1970年人民大学停办后我于1973年调到北大教书）。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年轻小伙子”，要我参加初稿的讨论。他甚至还约请乔冠华同志参加讨论。这个校译本经过三年努力、三易其稿，到1978年11月才问世，初版印数5万册，1979年3月18日我收到他赠书一册。这个新译本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作了很多、很大修改。成老在讨论中多次对我们讲：《宣言》开头一句原来译为“幽灵”，这是博古1943年根据俄文本改的，改坏了，幽灵是死人的灵魂，马克思用的德文Gespenst不是这个意思。1938年他把此词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1978年又改为“魔怪”。可见《宣言》中的重要词语，他在几十年之中一直都在不断推敲应该如何准确、鲜明、生动地译为中文。当然，1978年他这个新译本也并非别人都能同意，都认为译得最好的。近30年前我曾拟好了要点，准备就这个新译本写一篇书评，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我亲自到中央党校成老寓所找他面谈。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刚一年，成老是校长兼党委书记，全面主持学校工作，极为忙碌。但是他依然热情地同我交谈《宣言》中的好多译文问题。没有料到，他认为“译文只有是否准确问题，不能百家争鸣”。由此我想拙文只有留待成老百年之后再写了。1984年5月17日老校长仙逝，享年87岁。如今，我也已年过八旬，每次到西郊人大，见到矗立在校园的成老的塑像，对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都充满敬意，至今还不便下笔。

香港、台湾的6种译本

第十八种中译本是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出版的。这家出版社是香港的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者办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作为“新苗丛书”第13种，用优质纸张，且印刷精美，封面采用一张罕见的马克思正在凝神点燃含在嘴中的雪茄烟的半身照片。内容增加了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的《共产主义的前途》（写于1990年初，许由译）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写于1937年，刘宇凡、向青译）两篇文章作为导读，列在前面。《宣言》本身的译文没有署名，经我对照，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95年版的译文，但是修改有82处之多，应该也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例如，第一章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改译为“现代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第十九种中译本是台湾《当代》杂志于1998年4月1日发行的第128期（复刊第四期）作为“《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而全文特载的译文。这份杂志是我于2000年5月在美国访问考察时从友人处借来复印的。这一期的专辑还发表了《迈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与现代性》《幽灵与精神》《韦伯论〈共产党宣言〉》《正义的条件》、《永远的死对头》六篇纪念文稿。全文特载的《宣言》，经我核对，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58年的第一次译文，但是又修改了几十处，也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这本译文总的看来是把口头语较多地修改为书面语。例如把“同它”改为“与之”，把“把它”改为“将之”，把“前后”改为“前夕”。

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愿学习马克思主义者慢慢增多。我于1995-1996年到台湾考察、讲学两个月，看到好几所大学已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已涌现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98年《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当代》杂志才出特辑，可能还另有其他刊物登载纪念文章。不久前北京红展网主任、主编范强鸣同志，还帮我从网络上查到新世纪以来台湾新出版的三种《宣言》新译本，我都已买到。

第二十种中译本是唐诺译，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的。译者是台湾著名推理小说作家。这是一个中英文对照本，译本有很多新译法。例如，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改译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第二章末尾那句话改译为：“我们将拥有一个每个人为自身自由发展、而且以之为所有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书中还附有译者写的题为“先知的文件”的说明，长达88页。

第二十一种中译本是台湾启思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小32开本，封面与封底基本上一样，都是桔黄色，上端都印有白色《共产党宣言》五个特大号汉字（其中“产党”二字是繁体字），封面书名之下引用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概述《宣言》基本思想的一句经典名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封面当中印有马克思恩格斯著。最底下一行是启思出版集团国际华文版。封底当中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本书没有署名译者。对照译文，是对中央编译局1995年的译文作了上百处修改。如把引言中的“教皇”改为“教宗”，“当权”改为“当政”。把第一章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改为“各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物”。

第二十二种中译本是管中琪、黄俊龙译，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此书是作为“人类的经典文献”第34种。译者之一管中琪是台湾东吴大学著名教授。译文有不少新奇之处。如第一章标题是“布尔乔亚成员与普劳分子”，第四章标题是“共产党人回应诸多反对派的态度”。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普劳分子，联合起来！”书中还附有台湾大学国发所教授洪镰德写的推荐文和英国学者霍布斯邦（大陆译为“霍尔斯鲍姆”）写的《共产党宣言》导论。

在2001年至2004年短短三年之中竟有三种译本面市，可见台湾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者在增长。

第二十三种中译本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的。该书是作为“改变世界的宣言”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共有四本，其余三本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梭罗著《公民抗命》和美国卡逊著《寂静的春天》。丛书主编是美国尼尔·腾布尔，他囿于民族眼光，只把美国人写的三本书视为“改变世界的宣言”。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德国人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改变世界的一本宣言。这一套丛书每一本除编入原著外，还另加有序言、背景和作者、直接影响、深远影响、参考读物和网站、索引等，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原著。《共产党宣言》这一本的有关资料是左涛译的，经我查对《共产党宣言》原著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95年的译文，细加对照发现修改有84处之多。例如，“等级君主制”改为“半封建君主制”，“国家工厂”改为“国营工厂”，“大量的教育因素”改为“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等等。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北京红展网（www.181855.com）主编范强鸣同志，多年致力于收藏马克思主义和党建文献文物，他办的马克思展厅展出《共产党宣言》中外文珍本120多种，还有1949年后出版的120多种，以上我所列的中译本基本上都有。

总之，更多新译本的涌现不仅更广泛地传播了这本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不朽名著，而且有助于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这本经典文献。

（上接10版）

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竞争，归根结底确实是一场“智力”和“人才”的竞争。

而对复杂性事物有可能及时正确认识与决策的智慧与素质，是人脑所特有的。当然，谁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要靠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要靠崇高的品德和情感；要靠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的锻炼；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也就是要靠掌握大成智慧。这是单独依靠计算机，所永远望尘莫及的。

20世纪最具创造性才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马克思也说过：“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人非草木，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在进行学习、从事工作、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总会怀着各种各样的兴趣、情感、目的和梦想，构成其行为的动力。即便有计算机辅助，也会有成功，有失败，结果各异。

这就为教育工作者——人类灵魂工程师，提出了担负起培养青少年具有高尚品德、爱国热忱和科学精神等的重要任务。从认识上、心灵上，引领青少年走进崇高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使他们的身心都得到健康成长，以便日后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时，能够毫不畏惧，自觉地从爱国、自强、团结、奉献、求真、务实等的热情和愿望中，激发出无尽的才智和力量，逐渐磨砺成为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栋梁之才。这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也是大成智慧教育要求把理、工、文、艺结合起来的重要目的。

钱学森对大成智慧学硕士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大成智慧教育的丰富内涵。“（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这三点要求，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要求大成智慧学硕士在思维结构中应具备如下三个层次：

一是知识层：它是由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经验、感受（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及体系中已纳入和尚未纳入体系的知识与经验）等要素构成的，是思维结构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层次。离开了各种知识、信息、经验、感受等要素，也就无所谓思维。这些要素与从人—机结合的信息网络中检索出来的信息融通在一起，互相激发、碰撞、渗透、综合……是思维得以活跃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培育大成智慧的土壤。一般说来，知识层越深厚、越坚实、越丰富、越广阔，其思维的能力与品质就可能越高。

二是情感层：它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需要、意识、精神、品德、意志、意向、情趣等等因素构成的，是思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与调控层次。思维对象的选择、思维的动力、思维的效率与活力等，大体都受它们的影响与控制。钱学森认为，“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伟大的科学精神、崇高的品德、高度的爱国热忱、集体主义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往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穷力量。而理、工、文、艺结合起来，既具备渊博的学识又能会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将会使人们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威力。

三是智慧层：它是以知识层和情感层的整体融合为基础的，是由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观、人—机结合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等基本要素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有机地建构在一起的。是思维结构中最深刻、最复杂、最富于哲理的层次。这个层次的构筑要求：主要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灵活有效地汲取、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与经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集古今中外知识之大成，获得大成智慧与创造的灵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

大成智慧教育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总之，钱学森要求采取多种教育方式，培养青年人具有大智、大德的思维结构和内涵，为青年人思想的奔放驰骋提供一个广阔而科学的天地。有了这样思想文化基础的学生，适应能力很强，进入任何一个专业工作都可以，改行也毫无困难，处处可以乘风破浪，他们既是全才，又是专家，是全与专辩证统一的人才；也将是全面发展的一代帅才、将才，新世纪的主人、“新的人类”。

揭开智慧之谜，是世界性的难题。如何培养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人才，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各有奇招。多年来，钱学森一直主张逐步实行大成智慧教育，要理、工、文、艺相结合，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五育齐发展。并强调利用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以至教学内容的改革，开展电化教育、网络教育，组成人—机结合的教育系统工程。让人们都能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学得更轻松、学得更有效率。

他曾说：“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后来他具体解释说：“信息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把人脑记忆大量观察到的事实这一繁重的工作解放了。从前有个词，叫‘皓首穷经’，就是说要读一辈子的书，来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现在不必了，都在计算机中存着，只要你学会操作办法，去查就是了。怎么查？那就用我们过去说的科学技术体系，按这个体系去找。这一套东西有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是自古就有培养‘神童’的说法，但在怎么培养的问题上，各说各的，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今天有了信息革命这套东西，在培养‘神童’问题上就有了一个可操作的路线，这就是我说的大成智慧教育。二是生产的社会变化问题。从前人类的社会生产，体力劳动是主要的，脑力劳动所占比重较少，就是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信息革命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体力劳动会逐渐减少，而脑力劳动会逐渐增加，所占比重会超过体力劳动。即使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要有脑力劳动。所以，人类的劳动将重点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能够提供这样的社会条件。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搞的这种大成智慧，不但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光明讲坛
2008年第16期　总第55期
双周四出版
主持人：计亚男　殷燕召
电话：(010)67078803、8541
传真：67078118
电子邮件：010yananji@gmail.com
010yyz@sina.com